

● 综 述

“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戴 红 贤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戴红贤(1968-),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明代散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808-02

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教育学院、中国古代散文学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7月10日至13日, 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国家的80余名散文研究的专家学者聚集一堂, 围绕回顾、反思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和展望、开创21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的美好前景这个中心议题, 展开了热烈而细致的研讨。会议还举办了学术成果展览会, 展出与会学者带来的古代散文研究论文和著作, 促进了专家学者之间更广泛、更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的第一次盛会。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70多篇。有的清理了近10年来古代散文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 有的侧重探讨了50年来散文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有的回顾了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的历史。也有学者总结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情况, 而来自台湾和韩国的学者则重点介绍了各自近50年来古代散文研究情况与特色。总之, 近百年来, 中外学者尝试用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散文, 硕果累累, 成绩可观。同时, 与会代表也深切感到, 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其它领域相比, 古代散文研究还显得相对滞后。因此, 围绕如何提高古代散文研究学术水平, 会议着重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近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回顾和反思。

回顾和反思近百年来古代散文研究历史是为了继往开来, 推陈出新。我们站在新旧世纪的交会时期, 回顾和反思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与展望21世纪古代散文研究一样, 都具有深远意义。

近百年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可大致以20世纪50年代为界线分前后两期。前期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刘麟生《中国骈文史》、陈铨《中国散文史》等著作, 开辟了古代散文研究的历史。此后, 散文研究与诗歌、小说、戏曲等研究并列, 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古代散文研究的空前繁荣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据谭家健(社科院)统计, 1950年到2005年间, 出版古代散文论著近300种, 资料编著数十种, 发表论文则数以千计。其中90%以上都是近20年取得的。毫无疑问, 这都将成为21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的基础。20世纪古代散文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 (1)从文章作法、技法的研究到古代散文的艺术性探讨。前期以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研究多从文体辨析、演变、章法、结构等方面探讨文章作法。后期则从多方面展开了对古代散文的艺术批评。宁俊红(兰州大学)《近50年来散文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指出, 熊礼汇(武汉大学)从古代散文理论中总结出构成古代散文文学性、艺术美的最重要、最活跃、最具表现力的质素是理、法、辞、气、情, 凡古代散文都含有这五种质素。这是在借鉴古代文论基础上, 具有创造性的总结。五种质素构成了一个较完满的系统, 为研究作家作品的整体艺术风貌, 提供了可靠的路径。(2)从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到古代散文发展的宏观规律探讨。代表性的古代散文通史、通论著作有: 郭预衡《古代散文史》、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熊礼汇《先秦散文艺术论》(上下)、朱世英、方遁、刘国华合著《中国散文学通论》、贾祥伦《中国散文学发展史》等; 分体散文史有辞赋、律赋、史传文学、寓言、尺牍文学、游记文学等多种文体发展史著作; 断代散文研究则自先秦到近代有许多专著, 其中多有开创之作, 如武汉大学程水金从文化意识嬗变的角度, 对先秦散文的发生及发展线索进行了深刻且细腻的探寻, 出版了百万字专著《中国早期文化意识的嬗变——先秦散文发展线索探寻》第一卷和第二卷。以上研究从多个角度、多个截面探讨了古代散文发展规律, 作了有益的尝试, 但也存在不足, 如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何在, 古典散文的

审美意义和艺术追求较诗歌小说有何不同等,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第二,如何改进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和锻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批评话语。

改进古代散文的研究方法,可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从古代散文的文体特征出发,弄清某种文体的艺术形式、审美特征和风格倾向,从而探寻具体作家作品突破和超越前人和时人的艺术特色和风格。曾枣庄(四川大学)《论苏轼赋》、王长华(河北师大)和郗文倩(河北大学)《汉代赋、颂二体辨析——兼谈文体辨析地方法和意义》、谌东飏(长沙理工大学)《论古代杂文文体特征》、王基伦(台湾师范大学)《诠释与接受:欧阳修史论散文研究》等论文都是此种研究方法的代表。

二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相结合,即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散文艺术的嬗变及其原因与研究同一历史时期各类创作的艺术精神的互相融通和艺术特色的互相渗透相结合。夏咸淳(上海社科院)《明代中叶园林建筑与园林记——兼论园林画及戏曲》介绍了明代中叶园林记是由前代山水记衍生而来,并深入探究了园林记与园林建筑、园林画及戏曲等艺术的相互影响、渗透和推动。曹虹(南京大学)《智者喻于水——兼谈佛教与辞赋》将智者的水喻与辞赋的创作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也使人耳目一新。

三是研究古代散文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了解一家或一代散文特有的艺术趣味和社会审美心态,以探寻其艺术特色的成因。陈水云(武汉大学)《论晚明小品的世俗性》探讨了晚明士大夫阶层审美心态、趣味及自身的世俗化与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共同铸就了晚明小品的世俗品格。刘启云(湖北教育学院)《此翁岂作文,直写胸中天——晋宋学术思潮与陶渊明散文创作的审美倾向》探索了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对陶渊明散文审美倾向及其艺术境界的影响。

锻造富有民族特色的古代散文批评话语,是古代散文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难度最大的问题。与会学者比较一致认为:要建设古代散文批评话语,需要深入研究古代散文艺术理论。古代散文理论内容很丰富,至少可以归纳为文道论、文质论、文气论、文辞论、文法论、文境论、风格论、通变论等理论,只是其存在形式一般比较零乱,不成体系,新时期的古代散文研究要加强对这些零散材料的爬梳、整合、提炼,以锻造出富有民族特色而又有时代精神的古代散文批评话语。

第三,如何拓展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

首先要拓展研究对象。重要时期、代表作家固然是研究的重点,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其余研究对象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例如在唐代散文研究中,韩、柳古文历来是学者们倍加关注的对象,事实上还有很多其它作家作品或散文现象值得研究。熊礼汇(武汉大学)《略论元结山水铭文的修辞策略和美学风格》深入探研了元结复古散文的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及其对韩柳古文之影响。刘汾(湖南第一师范大学)《以诗为文,以情动人——论李白散文的独特个性》研究了大诗人李白的散文,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在两宋时期散文研究中,重北宋轻南宋的现象比较突出。闵泽平(三峡大学)《陈亮的英雄气质与文章风格》、王琦珍(江西师范大学)《论杨万里的散文与骈文》则将研究视野投放到被人忽略的南宋时期,在拓展研究对象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此外,陈蒲清(湖南师范大学)《韩国古典散文与中国古典散文》将韩国与中国的古典散文进行具体而细致的跨国比较。曾维龙(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中的古文教学概况——工具的解读与文化的承传:矛盾与局限》从古文教学的角度探讨古代散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也都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研究对象。

其次,拓宽学术视野也相当重要,如古代散文研究与现代散文研究的联系,散文与小说或其它文类之间的联系等。现代文学学者,如陈平原、杨义等在这方面呈现出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境界。古代散文研究大可借鉴。此外,台湾古代散文研究由书斋到社会、由文本理论到实用的发展走向,韩国散文研究由文学到语言、口语的走向特点,无疑对拓展古代散文研究视野都有启迪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拓宽古代散文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时,研究者要在两个问题上切实转变观念:一是从古代散文作品实际出发,认识其文学性和艺术美。要在充分而深入钻研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展开学术研究,宁拙勿巧。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总结发言时特别强调,要将细心体会、细心考察具体作家作品与提高理论修养结合在一起,尽可能克服研究的主观性(指没有文本基础的臆想、瞎想)和研究的片面性(指没有全面文本基础的一鳞半爪)。二是从事学术研究,以求真为基础,以求新为奋斗目标,常森(北京大学)《现代学术的自恋倾向——以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为考查中心》提出了以求真为基础的求新研究才是现代学术繁荣的切实之路。虽然这不是古代散文研究特有的问题,但要开创21世纪古代散文研究的美好愿景,转变观念至关重要。

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古代散文研究搭建了一个较高层次的交流平台。与会代表热烈友好、自由真诚的讨论和争鸣,既解决了一些问题,又启发出一些新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都将对今后的古代散文研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